

劳动力、人口和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姚 洋 余森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通过数据证明,中国当前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些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根据人口转型和城市化发展步伐来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还将持续至 2025 年左右。

关键词:劳动力;人口;出口导向型增长

JEL 分类号:F0;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09)09-0001-13

引 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奋力追赶发达国家。起初它们大多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或设立很高的非关税壁垒,用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并发展本国的幼稚产业,但结果却是差强人意。基于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即发挥其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事实上,以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也因此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采用了出口导向战略,中国经历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如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事实上拥有比日本更高的 GDP 值,位列世界第二。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中,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 10% 左右。尽管“中国奇迹”如今看来已毋庸置疑,但是仍然存留了一个问

收稿日期:2009-07-20

作者简介:姚 洋,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余森杰,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作者感谢田巍和徐晨馨的出色助研工作。当然,文责自负。

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在中国的卓越表现呢?

在本文中我们将证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植根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特征,包括:(1)大量的农村劳动力;(2)较低的城市化水平;(3)较低的人口抚养比。这三大基本特征使得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成为一种自然的经济选择;换言之,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

这里的经济学内在逻辑如下。中国囤积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使得劳动力收入的增长缓慢而且有限,加之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国不得不面临较小的国内市场,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低水平的人口抚养比造成了中国不平衡的经济结构:投资扮演着比消费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不得不将大量商品远销海外以解决过剩的国内供给。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讨论当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人口转型特征。第二节阐释中国的劳动力和人口特征与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并具体比较了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情况,发现两国在人口特征决定发展轨迹方面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第三节总结全文。

1. 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和人口转型

1.1 剩余劳动力

截至 2007 年底,中国 13 亿人口中有 7.27 亿居住在乡村,占总人口的 55.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7 年中国的农业产出只有 28,090 亿人民币,仅占 GDP 总值的 11%。由此我们不禁会问:中国农村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

鉴于上面给出的事实,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很显然。然而,对该问题的回答并非那么直接,当前发展经济学界的一个争论就与此有关,这个争论是:中国是否超越了刘易斯拐点?

根据刘易斯(Lewis, 1955)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工资将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逐渐耗尽后开始快速增长。以他名字命名的“刘易斯拐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在中国工资率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广泛流传,一些学者(如 Garnaut and Huang, 2006; 蔡昉, 2008)认为中国已经度过了刘易斯拐点。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不能盖棺定论。

按照定义,如果一个农业经济减少部分劳动力不会影响其产出,那么就存在剩余劳动力。考虑一个包括农业和工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经济,其总人口规模为 L , 可被分配到两个生产部门中。如图 1 所示,农业产出 Q 由一个短期生产函数 $F(l)$ 表示,其中 l 是劳动投入。如果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供给超过了点 L_1 (L_1 也被认为是短缺点),那么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就会变为 0;也就是说,此时存在剩余劳动力。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中,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然而,对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劳动的边际产出为 0,因此不能成为工资率。于是,每一位劳动力得到制度工资 w_s , 可以理解为是习俗决定的维持劳动力基本生计的工资水平。刘易斯拐点,即图 1 中的点 L_2 , 是当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 w_s 时的点。当农业雇佣了多于 L_2 的劳动力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小于 w_s , 因此工业就可以按固定不变的工资率 w_s 来雇佣无限多的工人,这就是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当工业中雇佣的劳动力超过了拐点,农业的边际产出就会大于 w_s , 工业则

不得不面对一条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这里的隐含之意是,当一个经济体超过了刘易斯拐点后,该经济体就必须面临不断上涨的劳动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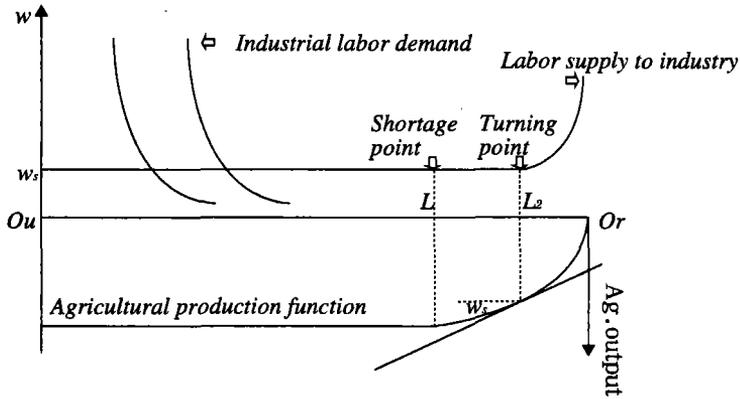


图1 刘易斯拐点

以中国来看,诚然底层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增长,然而,工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可以解释中国近期的工资增长。首先,真实工资的增长可能是由于农村收入增长所致,在图1中表现为 w_1 的增长,此时工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不影响拐点的情况下向上平移。由图2可知,中国农村的人均净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上涨至2007年的4140元;不仅如此,最近几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增长率从2003年的4.3%已增至2007年的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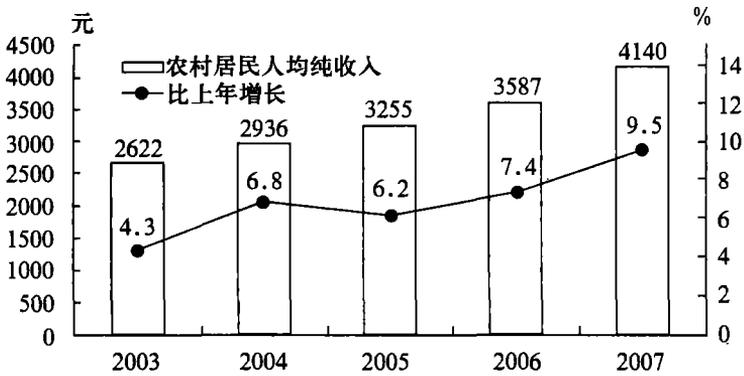


图2 农村人均净收入及其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多个年份)。

其次,工资增长也可能是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一种现象,此时需求曲线右移并与供给曲线的上升部分相交。但是,这种需求冲击很可能是暂时的,正如时下金融危机大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返乡所说明的。类似情况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后也曾发生过,当时四分之一的移民工人失去了工作(见图4)。

最后,正如上面提到的,农村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面对占总人口55%和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11% 的惊人对比,如果我们不把它解读为一种过剩劳动力的例证,恐怕难再找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没有过刘易斯拐点,我们利用各省的数据对中国近十年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模拟。图 3 显示了所选年份的几条曲线。这几年里中国都没有超过刘易斯拐点,因为需求曲线总是交在供给曲线平坦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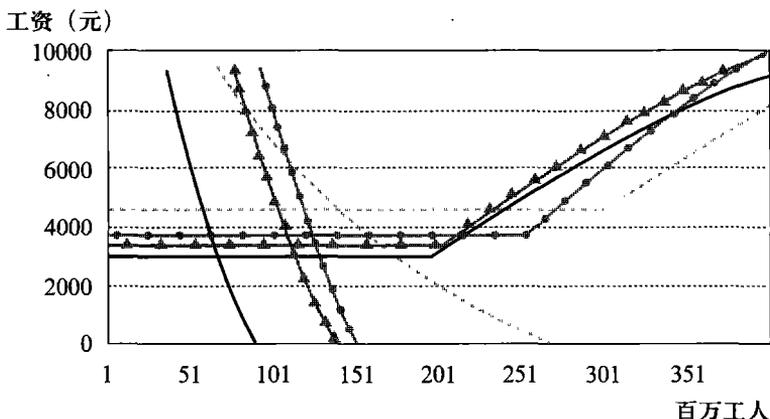


图 3 模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供给和需求曲线:1998、2002、2005、2007

注:图中曲线是作者计算出的模拟结果。——、—▲—、—■—和- - - -分别表示模拟的 1998 年、2002 年、2005 年和 2007 年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1.2 人口流动和城市化

城乡分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之一。1958 年中国建立了一种非常严格的居住登记制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户口”制度。它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1952~1992)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一种内在要求。为了保障重工业充足的资本积累,政府不得不依靠“剪刀差”向农民索取剩余,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政府得以从农民手中索取农业剩余(林毅夫和余森杰, 2009)。但是为了使“剪刀差”发挥作用,政府就必须限制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

自从经济改革以来,伴随着三次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浪潮,户口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开。第一次浪潮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小城镇发展战略时期。只要农村居民能够在城镇和小城市中找到工作或购买住房,他们就可以得到那里的户口。第二波浪潮开始于 80 年代后期。由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广东省为代表的诸多沿海省份对劳动力的需求陡增。于是,大量的人口流动产生并侵蚀户口制度。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浪潮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如图 4 所示,1993 年农村移民的数量达到 6000 万左右,十年后又翻了一番。

目前,原先持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正式的城市居住权。第一,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城市户口;第二,城市扩建将周边地区纳入城区范围,其居民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第三,转业军人可得到城市工作;第四,较富裕的人可以通过以较高

价格购买户口或在城市中投资取得城市户口 (Naughton,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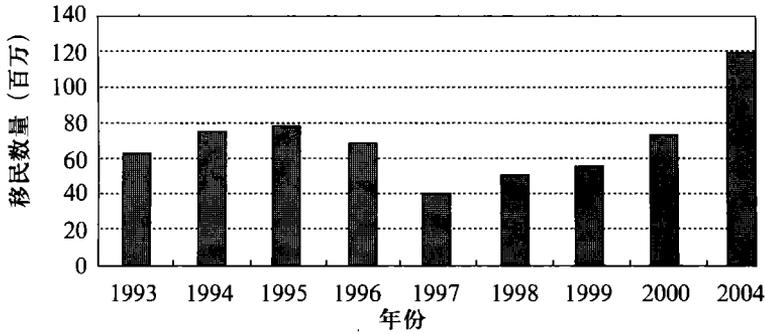


图 4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1993 ~ 2004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多个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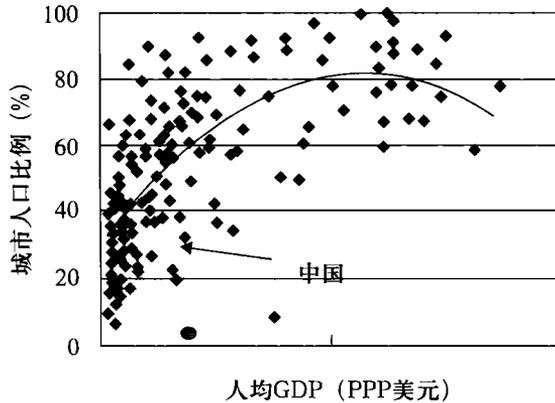


图 5 世界人均 GDP 和城市化水平(2003 年)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2006)》

尽管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是滞后于其收入水平。图 5 给出了 2003 年不同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和人均 GDP (PPP 美元)之间的散点图和非线性趋势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的趋势线。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计算(尽管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来进一步阐明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农业 GDP 占 GDP 总值的 1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却拥有 55% 的中国人口,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维持在 3:1 的水平,且所有农村居民只从事农业生产,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是多少。假设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比例将是 x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方程 $(11/89)/x = 1/3$,从中可以解出 x 等于 0.37 或 27/73。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农村居民只从事农业,并保持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变的话,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不再是 45%,而是 73%。当然,现实中农

村人口也从事非农工作,拥有非农收入。因此,这一估值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正常”城市化率的上界。

1.3 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指的是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它也是解释中国为何会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先将英国和中国的人口转型做一个比较。

作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早在 18 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由图 6 可以看出,英国的人口转型在 1750~1980 年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 200 多年间,英国的死亡率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只有 20 世纪头十年和 40 年代例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死亡率都有增长。英国的人口转型主要由出生率的变化决定。第一阶段是从 1750 年到 1790 年,期间出生率由 35‰ 上升至 40‰ 左右,但由于死亡率也很高,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第二阶段是从 1790 年到 1929 年。出生率在该阶段前期增长,但随后持续下降超过一百年,并于 1910 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达到最低点。但是死亡率却下降得更快,因此人口迅速增长,尤其是在该阶段的早期。这段时间英国享受到了大量的人口红利。第三阶段是从 1929 年到 1980 年。这一阶段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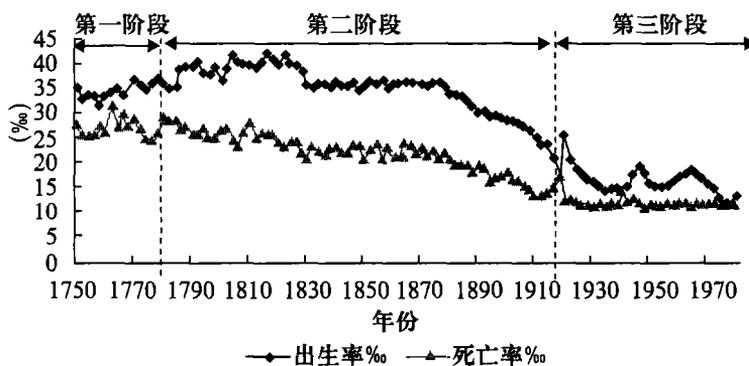


图 6 英国人口转型(1750~1980)

来源: Maddison(2001)。

图 7 显示的是 1950~1981 年间中国的数据。这里提供了三条曲线,分别表示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和死亡率。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出生率就开始下降,并于 1960 年因大饥荒(1959~1962)而达到最低水平。饥荒之后出生率大幅度上升,但随后持续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饥荒之后几年出生的人进入了生育期。最有趣的发现是,作为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的自然增长率自 1966 年以来几乎保持固定,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除了饥荒时期,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与英国的第一阶段相应的时期。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多处于第二阶段,目前这一阶段也接近尾声。和英国长达 140 年的第二阶段相比,中国的第二阶段由于计划生育被大大压缩了。

然而,计划生育带来了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下降。人口抚养比是指年龄在 16 岁以



图7 中国人口转型(1950~2001)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份。

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年龄在此之间的人口的比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07年仅为0.4,不仅低于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还绝对是世界最低水平之一。图8显示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地区工作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即人口抚养比的倒数),这一结论不言自明。平均来说,东亚国家目前拥有最高的工作比率,之后依次为欧洲、美国、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换言之,东亚国家拥有世界最低的人口抚养比。不过该指标从未低于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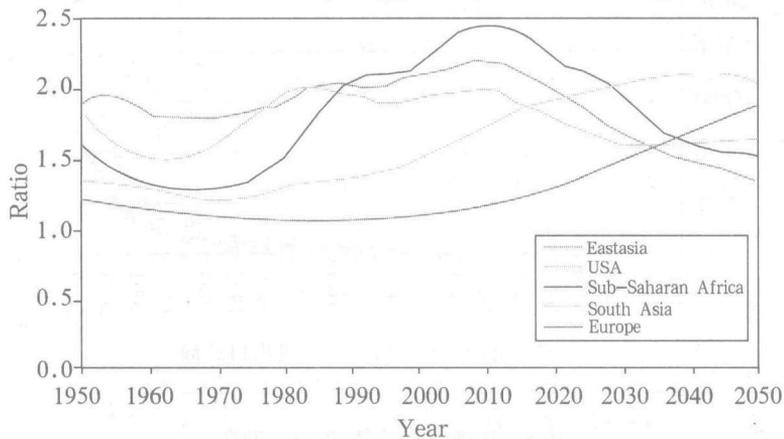


图8 世界范围的劳动人口与被抚养人口比率

来源:Bloom等人(2007)。

中国的低人口抚养比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多重的潜在影响。首先,由于低人口抚养比,中国得以拥有极为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其次,人口抚养比越低,储蓄就越高,因而消费就更少。最后,低人口抚养比还会使投资比率更高、资本积累更快。总之,低人口抚养比可以说是自1978年经济改革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Bloom和Williamson(1998)的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可以解释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东亚奇迹以及17%的中国

增长。

中国令人瞩目的人口红利到底能持续多久呢?毋庸置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抚养比势必上升。2007年,中国64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11亿,占13亿总人口的9%左右。最近一份官方预测显示这一数字将于2015年达到2亿左右,而在2044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可能不会迅速下降。2008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50.3%。^①没有理由相信如此之高的储蓄率会在近期内迅速下降。这一结论也得到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证据支持,两国也都曾出现过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滞。

综上所述,人口是决定中国增长模式和增长轨迹的根本动力。中国压缩了其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也因此使其经济增长走上了不同寻常的道路。此外,大量的农村人口也预示着中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成本”的经济增长。

2. 人口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受到中国人口特征的影响,中国经济有两大特点。第一,出口导向战略是市场推动和自我选择的。低抚养比和大量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过度供给的制造业产品必须出口国外。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进程不断加速,中国经济充分地整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图9中1950~2007年间中国进出口的数据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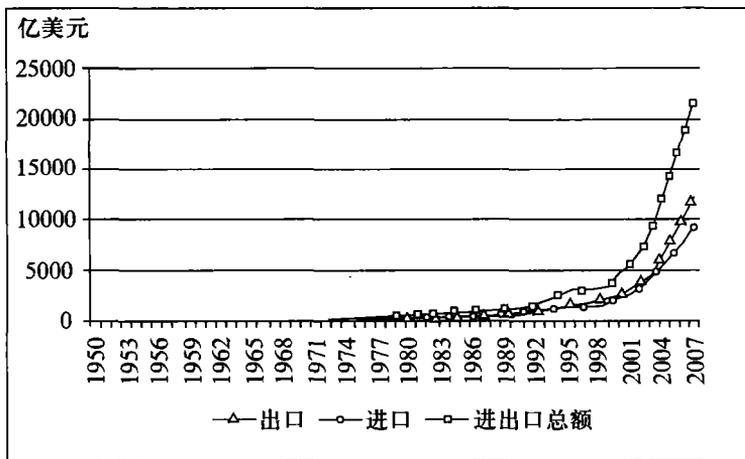


图9 中国对外贸易:1950~2007

来源:佟家栋(2008)。

除了出口以外,中国的人口转型还意味着较大比重的投资和较小比重的消费。投资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利润的快速积累,而后者又是低工资水平的结果。中国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自1998年以来显著地快速增

^①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www.stat.gov.cn

长。如图 10 所示,一些关键的会计指标,如利润总额与权益比就从 1998 年的 5% 增至 2006 年的约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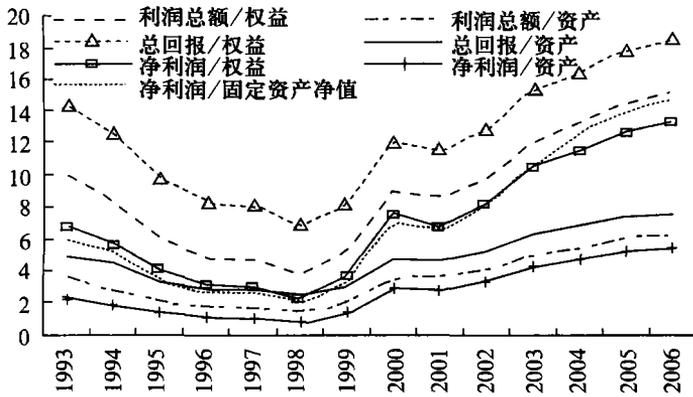


图 10 中国企业利润率

来源: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课题组(2007)

另一方面,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内的比重日益下降。如图 11 所示,该比重由 2000 年的 60% 左右下降到 2007 年的 46.3%。如果考察自 1978 年以来更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会发现这一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认为官方数据存在一定问题,并重新计算了劳动收入比重,其结论显示在图 12 中。即使根据他们调整过的数字,中国的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仍然在 1995~2004 年间下降了 5 个百分点。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意味着伴,相对于中国 GDP 的高速增长,人们却变得越来越“穷”了。这就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有一个较“小”的国内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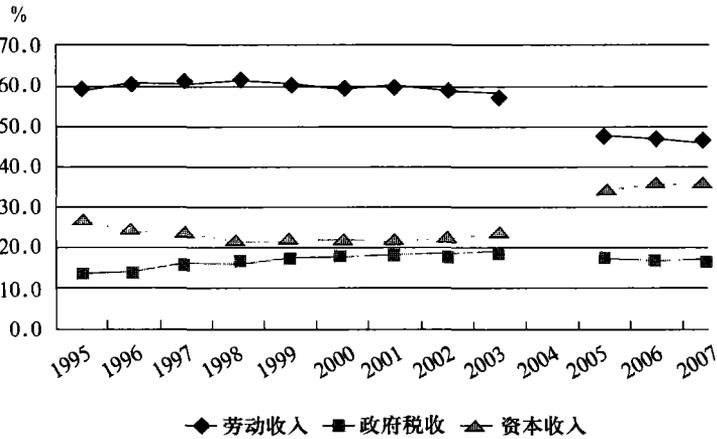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 GDP 的收入构成

注:数据来源于多个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004 年的数据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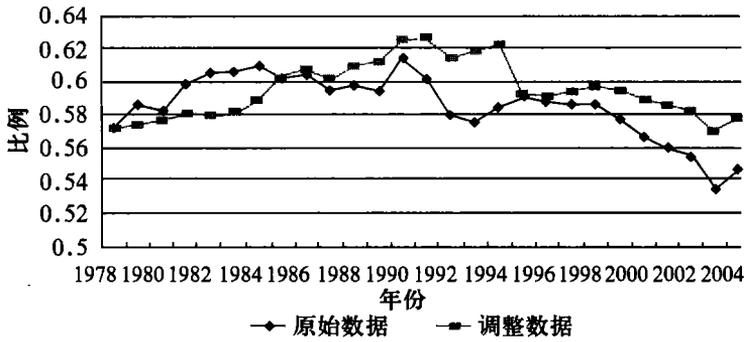


图 12 劳动收入占中国 GDP 比重

来源: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

与此相对的是,企业和政府却变得相对富有了。资本收益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22.2% 上升至 2007 年的 36.5%。这些资本收益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利润。另外,政府收入的比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有所上升,但在 21 世纪初稳定下来。由于存在这种劳动收入和企业、政府收入之间的不对称,近期中国储蓄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和政府。图 13 显示了商业银行中储蓄的构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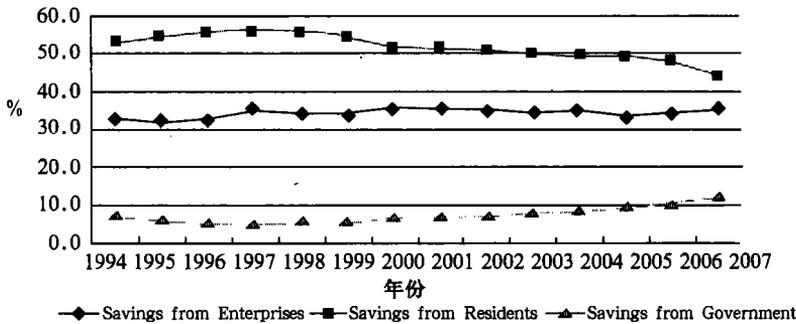


图 13 商业银行中的储蓄构成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多个年份)。

与上述数据一致的是,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在下降,而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比重在上升(见图 14)。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消费的比重就开始下降,但近几年下降速度显著加快。在 2000 ~ 2007 年间,该比重下降了超过 10 个百分点,以至于仅占 GDP 支出的 48%。与此同时,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却分别达到了 GDP 的 43% 和 9%。

为了探究人口抚养比和储蓄及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提供一组二战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对比。正如下表中所示,中国和印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具有相似的人口抚养比,然而 40 年之后,如今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较印度低得多。由此表可以得到的重要信息是,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两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上升了,虽然中国的储蓄率比印度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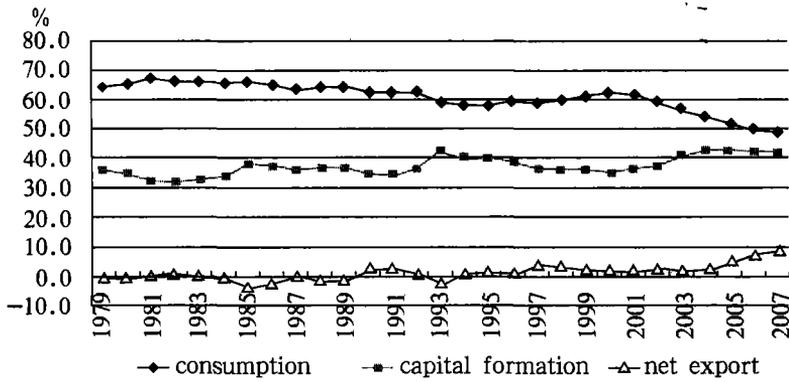


图 14 中国 GDP 的支出构成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多个年份)。

但是两国的差距基本上保持在 13 个百分点左右。这就意味着,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印度的储蓄率比中国的增长得更快。

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就是,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也在下降。图 15 分别绘出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消费占 GDP 的百分比与人口抚养比的关系,它们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有意义。尽管当人口抚养比下降至 65% 以下(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之后,中国的消费比重下降得很快,但是,印度的消费比重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而下降得更快:在抚养比从 75% 下降到 60% 这个区间里,消费比重从近 90% 下降到 70%。这说明,中国消费比例的下降并不是孤立的,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其他国家的消费比例也下降。

中国和印度的比较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2000 - 05
印度					
人口抚养比	77.8%	76.8%	71.7%	67.0%	61.8%
储蓄率	13.0%	18.0%	19.9%	23.8%	26.3%
投资率	15.1%	18.1%	21.8%	25.2%	26.0%
中国					
人口抚养比	79.0%	74.8%	57.4%	48.1%	43.6%
储蓄率	25.6%	34.7%	35.4%	38.5%	39.8%
投资率	26.1%	34.8%	34.8%	40.6%	42.2%

来源: Ahya 等(2006)。

上述比较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中国的增长模式不是唯一的,它符合关于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关系的理论。第二,一般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具有误导性。两国所采取的看似不同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只是同一发展轨迹上的不同阶段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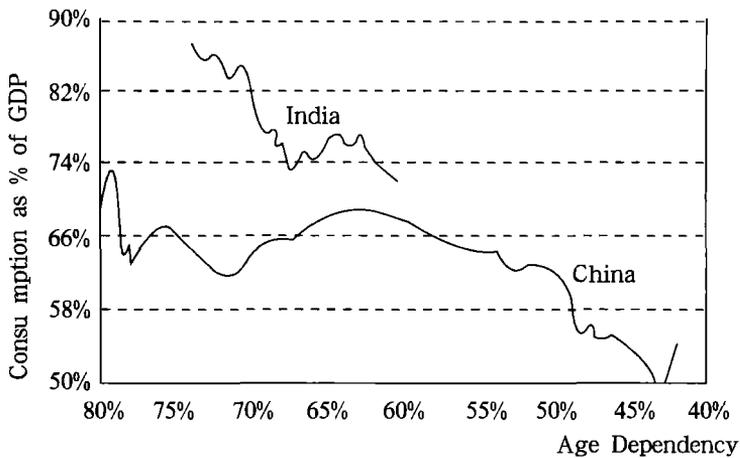


图 15 中、印消费占 GDP 比重与人口抚养比的关系

来源: Ahya 等(2006)。

3. 结论

本文通过经验数据证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中国经济具有两条重要特征:低人口抚养比(相应的是高人口红利)和低城市化水平。我们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并揭示了两国采取的看似不同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由人口决定的同一增长路径上的不同阶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以积累大量未尽利用的储蓄为代价的,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就是明证。但是,通过缩减出口以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做法是错误的,出口是中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方面比较优势的最优选择。促进国内消费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却难以奏效,这是因为,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是由人口和城市化等长期因素所决定的。为了提高国内消费,中国必须采取相关的结构性调整,其中,加快城市化步伐是重要一环。

加速城市化将会带来巨大效益。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 2.57 倍,如果城市化水平升至 73% (即 1.2 节所得到的数字),那么全国消费将会增加

$$(27\% + 73\% * 2.57) / (55\% + 45\% * 2.57) - 1 = 25.8\%$$

这样,消费占 GDP 的比重将会由目前的 49% 上升至 61%,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注意,这是在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得到的数字,而且仅仅考虑了消费增加的直接效果。城市化还会导致服务业的扩张,而这又会反过来促进消费,因为服务业比制造业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发挥一国的比较优势(常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基于中国人口特征的自然选择。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要跟随中国的模式,但它们要探索符合自身的物质禀赋和人力禀赋的发展模式。这点对于印度尤其重要。作为一个与中国具有相似人口

特征的国家,印度的最优选择是发展制造业,与之相伴的,印度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出口。

参 考 文 献

- [1] Ahya Cheten, Andy Xie, Stephen Roach, Mihir Sheth, and Denise Yam (2006). *India and China: New Tigers of Asia*. Mogen Stanley Research Report.
- [2] Bloom, David E, Canning David, Richard K. Mansfield, and Michael Moore (2007). "Demographic change,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saving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4(1), pp. 92 ~ 114.
- [3] Bloom, David E.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1998).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 pp. 419 ~ 455.
- [4] Garnaut, Ross and Yiping Huang (2006).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 [5] Lewis, William Arthur (1955).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Homewood Press.
- [6] Maddison, Angus (2002).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Studies.
- [7] Naughton, Barry (2006).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8] World Bank (2006). *World Bank Indicator (WDI) CD - Rom*.
- [9] 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44(3),第27~41页。
- [10]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企业利润率”,CCER工作论文。
- [11] 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2] 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13] 林毅夫、余森杰(2009),“我国价格剪刀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经济研究》,44(1),第42~56页。
- [14] 佟家栋(2008),“中国对外贸易和展望”,“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会议论文,宁波,2008年11月。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export-oriented growth model is an unavoidable choice for China given its demographics and low level of urbanization. Low dependency ratio and low urbanization rate jointly determine a large amount of supply of labor and a slow growth of labor income, which in turn leads to fast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However, the two factors also determine a relatively small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only way to clear the market is to export. Judging by the pa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paper expects that China's export-oriented model will continue between now and 2025.

Key Words: labor force, demography, export-oriented growth

(责任编辑:胡海刚)(校对:HA)